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國政經轉型的常態異例？—本土化微觀轉型議程蒐例

Anomaly as Serendipity: Gathering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Political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doi:10.30390/ISC.200008_39(8).0001

問題與研究, 39(8), 2000

Issues & Studies, 39(8), 2000

作者/Author：石之瑜(Chih-Yu Shih)

頁數/Page：1-1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0/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08_39\(8\).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08_39(8).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國政經轉型的常態異例？ ——本土化微觀轉型議程蒐例

石之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 要

轉型研究本身應當受到在目的論、本體論和知識論上的檢討，因為這一類研究對於人們產生引導的效果，使符合某一種政治主張的分析方式得到較容易表達的機制，也使不符合的想法或情感傾向缺乏論述的空間。本文的計畫是，先檢討當前轉型理論的有關預設，探索轉型這個概念所可能暗藏的線性史觀和歐洲中心思維，再提出以微觀動機和回應模式為對象的歸納，來豐富轉型研究的內容。本文將從過去若干研究或生活經驗中，汲取十個微觀轉型的路徑，這些路徑在宏觀轉型理論中屬於異例，但經由歸納，本文點出了異例不異的可能性，將異例的存在視為普遍的常態，則轉型研究的前提、方法和內容恐怕均應大幅修正。

關鍵詞：中國大陸研究、政治經濟學、民主轉型、體制改革、社會科學本土化

* * *

壹、前 言

政治學中的轉型研究是一種宏觀的政治經濟分析，研究者只要將轉型的路徑和趨勢掌握住，通常個別行為者的動機或調整路徑就並非研究所關切的重點。^①轉型研究的這個宏觀特性，使得研究者不能照顧到轉型過程中所存在的異例，則異例的多寡，或異例的種類到底能否為轉型的發生做反證，也是轉型研究者所少論的課題。故若在微觀層次存在大量未察覺的異例的話，則不但異例不能稱之為異例，而應當視為是一

註① 參見吳玉山，林文程，江水平，後鄧時期對大陸及台灣的震盪（台北：財團法人國家發展文教基金會，民國89年），第一章。

種常態，並且所謂的轉型，就成為值得質疑的分析概念了。^②在這裡所需要的一種研究角度，是如何讓轉型的意義不完全受到轉型理論的壟斷，而是由被視為在轉型過程中具體的人們來詮釋。^③這一點似乎是轉型研究中非常欠缺的，也就是本文試圖要彌補的，即提供研究對象一個發言的機制。^④換言之，在收集各種異例的工作充分之前，很難判斷轉型是否真的發生。

如果轉型的發生與否，不能單純透過對宏觀制度規範或公民文化中的行為變遷來判斷，那轉型研究的方向何在呢？本文的計畫是，先檢討當前轉型理論的有關預設，探索轉型這個概念所可能暗藏的線性史觀和歐洲中心思維，再提出以微觀動機和回應模式為內容的歸納，來豐富轉型研究的視野。本文將從過去若干研究或生活經驗中，汲取十個微觀轉型的路徑，分別為半轉型、輪轉型、幅轉型、折轉型、非轉型、倒轉型、反轉型、超轉型、不轉型、偽轉型。這些型不是來自於抽象模式下的演繹邏輯，而是在實際中先有例證，然後再取型的名稱。經由這種歸納，本文點出了異例不異的可能性，將異例的存在視為普遍的常態，則轉型研究的前提、方法和內容恐怕均應大幅修正。

貳、當前政經轉型理論之不足

一、既有轉型理論

在目前研究中國政治經濟轉型的文獻中，主要課題集中在兩方面，一是關於民主轉型的研究，一是關於體制改革的研究。民主轉型是九〇年代最盛行的社會科學項目之一，不但將六〇年代曾經盛極一時的「政治文化」研究重新搬上議程，同時也應和了世界政治中一波看似不可抵擋的民主化潮流。主要的幾個研究焦點包括了各國的民主化過程是如何展開的？^⑤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這個過程獲得了啟動？^⑥民主化過程出現的幾個臨界點在哪裡？^⑦過了這個臨界點之後，如何保障民主化的進程不會出現逆

註② 關於這個研究態度可參見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s* (London: Routledge, 1994).

註③ 參考文畢真，「世紀末反思中國文化」，中國評論（香港），第17期（1999年5月），p. 11.

註④ 現代化研究中研究對象的發言機制與論述位置的探討，例見 Fred Dallmayr, ed., *Border Crossings: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9).

註⑤ 例見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ns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5);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3).

註⑥ 例見 Samuel Huntington, "How Countries Democratiz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6, No. 4 (1991-92), pp. 579~616; Arent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⑦ 例見 Doh Chull Shin, *Mas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Democratizing Kor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ianjian Shi and Andrew Nathan, "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Daedalus*, Vol. 122, No. 2 (1993), pp. 95~123.

轉？^⑧一言以蔽之，人們希望能夠具體解釋，民主化過程為什麼發生與成功（或失敗）。

一般而言，人們提及的因素有領導人、社會分歧、選舉制度、政黨結構、危機（經濟、政治、外交）、巧合等。其中普遍性最高的民主化條件似乎是市民社會的萌芽與茁壯。在中國研究裡，通常中國政治被視為是威權政治，不是民主政治，人們好奇的問題是，中國發生民主化的條件成熟沒有？九〇年代頗為普及的村民自治制度算不算民主化的先聲？^⑨要回答這個問題的學界同好，幾乎千篇一律地關心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特質，企圖找尋證據來說明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正在出現或尚未存在，社會對國家的依附是持續穩固或逐步降低。^⑩近來關心的焦點慢慢更具體地集聚在選舉行為上，從村領導的民主選舉中探討大陸選舉制度的優缺點。至於民主鞏固的相關課題，在一般中國研究期刊中所出現的，主要是針對台灣憲政制度與黨政結構的多，^⑪關乎大陸村民的少。

體制改革則是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另一個風行草偃的課題，其中膾炙人口的就是新制度主義學派最關心的產權改革。體制改革的重要性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與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而益形提高，如何將原有的公有財產制轉化為適合市場競爭的產權體制，不僅是一個科學的分析問題，同時也必定是一個帶有應然性的規範問題。取代公有財產權的制度有哪些？人們研究股份制與私有制，也研究國有企業的改革。^⑫對於政治學家來說，體制的轉型不是紙上談兵，更代表著政治權力的運作與重組，所以許多研究的對象，就放在了政治權力與產權關係複雜多變的鄉鎮企業上。^⑬鄉鎮企業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如雨後春筍崛起，他們在利潤與效益上的表現各有不同，引起學

註⑧ 例見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Harry Eckstein et al., *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Adam Przeworski et al., "What Makes Democracies End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1 (1996), pp. 39~55.

註⑨ 例見朱雲漢等，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民國87年）。

註⑩ 例見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dward Fried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Armonk: M.E. Sharpe, 1995); Chih-yu Shih, *Collective Democrac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evin J. O'Brien, "Agents and Remonstrators," *China Quarterly*, No. 143 (1994), pp. 359~380.

註⑪ 這方面的文獻最多出現在 *Issues & Studies*；另外，這也是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最流行的台灣留美政治學家之博士論文課題。

註⑫ 例見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Vol. 54, No. 5 (1989), pp. 663~681; David Goodman and Brian Cooper, eds.,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 1994); David Granick,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0); Keun Lee, *Chinese Firms and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1).

註⑬ 例見徐斯儉，「大陸農村的基層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5期（民國88年5月），頁3~33；Jean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1995), pp. 1132~1149; Yasheng Huang, "Web of Interests and Patterns of Behavior of Chinese Local Economic Bureaucracies and Enterprises during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5 (1990), pp. 431~458.

術界加以分析的興趣。直到現今鄉鎮企業的勢頭漸緩，研究鄉鎮企業產權的學位論文卻還不斷增加。這裡主要的觀察點包括鄉鎮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因而又與前述民主轉型研究中對市民社會的興趣相銜接。

可以說，研究中國政經轉型不可或缺的關鍵，恰恰在於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模式有無發生轉型。^⑭轉型之前的中國，是個國家穿透社會，且市民文化不彰的威權體制，今天轉型已然發生的指標，則在於出現了國家統治之外的社會。這時的社會具有自發性，依據市民自己的利益結構，這個新興社會影響甚至穿透國家機器。市民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社會要擁有自己的資源，而這一點只有仰賴於產權制度的革新，於是政治權力對於產權改革的態度就成為眾所矚目之課題。

二、轉型研究的史觀

雖然鄧小平在推動改革的時候，沒有預設一個具體的發展模式，只有要求國民生產總值翻幾翻的目標，但研究近年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的時候，人們通常會藉用轉型的概念。^⑮在英語文獻中的轉型有較為明確的參考依據，也就是依照現代化理論所設定的一個線性發展階段，及所要達到的最高階段，即以所謂先進民主國家當前的政治經濟狀態為規範，因而才會出現上述對市民社會或產權結構的關注。有這個未來目標作為導向的研究，與沒有這個目標時所作的研究，兩者之間對中國大陸目前所處的發展形態有不同的定位。在蘇東集團瓦解之前，中共的政治是以一黨專政、中央計畫、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耳熟能詳的概念來分析，^⑯它並不是一個處在變動中即將被取代的一個型，而是一個似乎具有本質性的一個類別。換言之，中央計畫與市場經濟是相互平行，彼此比較的兩個路線。^⑰

在蘇東集團瓦解之後的轉型研究中，中共所代表的型，變成了要以「權利」為參考依據來分析的一個歷史階段。^⑱於是乎，產權成為解釋中央計畫之下企業行為的一個出發點，這個出發點的來臨，使得線性史觀預設的私有財產權凸出成為一個被追求的典範，也同時使得中共成為轉型研究的對象。所以，是轉型的研究在賦予中國大陸的政經狀態一個意義，先有轉型概念，才会有定義型的需要，而且對當前的型進行理解的方式，是受到作為目標的型的制約，即先進的、待轉入的型決定了待轉出的社會型態為何，不是目前既有的型先獲得確立，再去研究未來可能轉變成什麼型。

在這裡，線性史觀起了認知上具有絕對性的主導作用，不僅以美國為首的英語文獻在現代化史觀之下，預期非自由主義、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終將邁向此一模式，就連矢志推翻資本主義的階級史觀，都留下了強烈的線性史觀傾向，這部份說明了何以「轉型」這樣一個預設了線性歷史發展的研究議程，會迅速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面

註⑭ Dorothy J. Solinge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rmonk: M.E. Sharpe, 1993).

註⑮ 例見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民國85年）。

註⑯ 例見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5).

註⑰ 如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註⑱ 例見 Yushan Wu, *Compara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回應。^①如前所述，線性史觀對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界定，決定了人們如何看待當前所處歷史階段的屬性，因此轉型研究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目的論的涵義在內，就算研究轉型的人不預設轉型之後的新型為何，但一旦具體的分析啓動了之後，用來定義型的那些指標，如市民社會的自發程度，私有制所佔的經濟比例、國家對社會進行規範的能力等等，必然也能說明那個潛在的、未來的、待轉入的型是什麼方向。

有的人爲了避免歷史宿命論，因此特別留意在大的轉型方向之下，大陸出現了哪些中國特色，包括對中國的國家性質加以定義，使有別於文獻之中的政府機關與統治建制（establishment 或 regime），因此就好像避免了以西歐發展的經驗來檢證並預期中國大陸的發展。^②由於在實際政治中，中國特色的說法並不能指出一個明確的政治方向，只是昭告天下黨有了改革的決心，則以中國特色爲標語的研究，最多只是表達了研究者對西方發展模式的一種抗拒，^③但此一抗拒意義不長遠，畢竟所謂中國特色的研究和中國特色的改革一樣，不能將型的概念撤銷或取代，故除了彌補自己接受了「型」或「轉型」概念時所失去的論述主導地位外，並未能擺脫那先進的型對自己思路的隱隱制約。

三、微觀轉型研究的探索

由於從歷史宏觀來看「型」，致使轉型研究者未曾試圖由微觀角度來談轉型，這就事有蹊蹺。從整體而言，轉型研究是在線性史觀導向下，以「型」的界定爲前提，以轉換過程爲對象的知識建構活動，蒐集的資料與分析的進行是針對轉換過程，因此使得關於對「型」的界定，或「型」是否發生變動的判準從何而來等問題，有所規避，也就無異於假定讀者也已經承認有至少兩個「型」的存在。毋庸置疑的是，型的參考依據（尤其是待轉入的型的參考依據）通常在西歐歷史經驗中找尋，這首先是因爲歐美發展進程世代以來都是中國人的先進模範，^④除此之外只有東洋經驗，而東洋經驗也是以泰西爲師的。其次也是因爲，中國人固有的循環史觀中提供不了一種向前進步的範型，^⑤故與轉型研究中的目的論預設不符合。最後也是因爲，中國文化推崇一以貫之的表面大道理，使人們普遍假裝只存在一種中國的型，^⑥則歐美作爲一種型相對而言似乎格外清晰。

註① 例見陳烽，「社會型態的兩重劃分與社會主義及其初級階段」，輯於上海市委宣傳部編，第一次大潮（上海：三聯，1989年），頁82~95。

註② 例見嚴謹、曹俊漢合編，中西方經濟觀與現代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Tang Chou, "Back from the Brink of Revolutionary- 'Feudal' Totalitarianism," in V. Nee and D. Mozingo,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3~88.

註③ 例見黃光國，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台北：巨流，民國77年）。

註④ 參見David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⑤ 參見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註⑥ 參見Lucian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宏觀的線性歷史導向對於個別人進行研究的目的，恰在於看這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市民社會出現的預期，但不論是否符合，這個人本身個別的政治、經濟參與行為是什麼原因促成，或動機何在，就非轉型研究所關切。轉型研究旨在發掘，什麼樣的產權制度誘發了什麼樣的參與行為，而不問一個產權制度得以發生的動機基礎是什麼，也不問同樣一個參與行為同時還伴隨了什麼其他轉型研究者所不關心的行為調整。這就造成轉型研究的極大偏差，因為「型」的變化可能無關乎行為者的動機，型的「選擇」對行為者而言是工具，不是目的。

如果不從「型」去看人，而從人去看「型」，則轉型研究中所謂的型就不再具有論述上的決定地位，因為型的意義必須由實際的人來詮釋，行為者成了詮釋的主體，而研究者不再以宏觀的線性歷史規定人的發展方向，這時候來談型或轉型，就可以擺脫目的論，也順理成章地不必非要以西方經驗來當成型的分類依據。^⑤果真如此，某一個人的轉型不能決定另一個人的轉型；宏觀的轉型行為趨勢，更不能壟斷個別人依附在這個趨勢中，卻從事與轉型相反的其他行為。由於當前轉型研究中缺乏微觀意識的考察，所以很自然地成為方法導向、理論導向、模型導向的演繹分析，目的論的傾向就難以避免。^⑥如何將問題導向、動機導向、情境導向的歸納分析引進轉型研究，關係到轉型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免於成為現代化線性史觀的宣傳看板，而使中國政治經濟變遷當中豐富紛雜的回應，得到論述上的表達空間。

不能否認以現代化線性史觀為核心的轉型研究，不僅反映了，也影響了實際行為者的思惟，故轉型研究看起來將益加顯得言之成理。所以微觀的研究不能不承認許多行為者已經接受自己所處的，是一種正在轉變，甚且將脫離（或脫離不了）的某種落後的型。故微觀的轉型研究任務，不是去否認轉型的認知已經深入人心，而是觀察個別行為者如何具體回應於宏觀線性史觀引領的轉型方向。至於回應的模式或方向為何，就非先驗的線性史觀所能置喙，即微觀的轉型研究拒絕集體轉型的不可逆轉。^⑦以下，本文將例舉十種對轉型的回應，透過這些回應來說明，宏觀轉型研究中迷戀市民社會與產權改革等概念，與生活中的人常不相干。

叁、對轉型的紛雜回應

一、半轉型（quasi-transition）

半轉型是指停留在兩個典型之間的持久狀態，轉型只完成一半即停止，類似於Homi Bhabha所談的介中性（in-betweenness），進退不得。^⑧行為者對於所謂新型

註⑤ 參考王俊國，「由自我異化來看中國現代化的斷裂」，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民國89年7月。

註⑥ 有關問題導向的研究，參見John Adair and Rolando Diz-losing, eds., *Applied Psychology*, Vol. 48, No. 4 (1999)。

註⑦ 相反的說法是，微觀層面的行為者，可能沒有認知到現代化的價值，但他們的轉型不可避免，見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北京：三聯，1998年）。

註⑧ 見Homi Bhabha, "The World and the Home," *Social Text*, No. 31-32 (1993), pp. 141~153.

態的社會制度不能完全內化，但舊有行為模式已經因應新制度或新結構的出現，難以復返，以致於一身同時兼具了舊型與新型的規範，但卻又不為舊型下或新型下的行為者所接納。不能完全進入新型的主要原因，在於新制度所誘發的行為變遷受到其他行為動機或需要的牽制，而新制度的設計與引入並未考量到這些其他需要。這種情況，應當比較容易發生於新制度迅速由外力輸入的情況中，使得舊制度與既有需要在發生轉變之前就必須回應，導致制度演變的不可能。^②

這個形態的轉型是根據對台灣外商公司女性專業人士的研究得出。^③根據這項研究指出，女性財務經理級人士受到國際會計原則的規範，代表母公司對本土售貨人員進行會計監督，這些售貨人員通常以男性為主，並以台灣分公司總經理為首腦。與男性財會相比，女性較不強迫本土售貨人員完全遵照原則，但這不是她們不尊重原則，只是她們將母國規範與本土實踐的衝突加以解決的心理需要，明顯較男性為低。這應當與女性成長經驗中，受社會形塑成對內在邏輯一致的需要較弱所致。她們的專業素養毋庸置疑，但她們鮮少像男性財會傾向採取對抗的高姿態。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受訪的女醫師、女律師、女記者的紀錄之中。半轉型式回應的存在，緩衝了國際與本土之間的對立，也使得透過女性所中和的對立，在母公司與總經理眼中看來溫和許多。研究進一步推論指出，台灣女性專業人士在母公司與本土售貨員之間的角色，類似於台灣在中國政經轉型之間的位置，也是進退不得的介中性。

二、輪轉型 (re-transition)

有時候，轉型的發生看起來如此真實，使人不會懷疑轉型已然發生。但是如果把研究的時間點拉長，卻會發現已經發生的轉型行為在一定時間之後，又回到轉型前的行為模式，故轉型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轉型研究一般都已注意到的，第二個階段則發生在不同的情境中，而這些情境並非轉型研究所關切的。故如果從第二階段開始觀察的話，會以為轉型從未發生。輪轉型可能只有一個週期，也可能有數個週期，必須同時觀察到整個週期中往返的兩個轉型，才能充分理解行為的動機。^④輪轉型與半轉型不同者，在於輪轉型已經完全進入新型之後再返回，而半轉型是從未完全符合新型行為模式。

輪轉型的提出，是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利通市郊五個回民村的訪談歸納得到。^⑤受訪者在說明回民的伊斯蘭認同時，提到村民在四十歲之前與之後的行為傾向。如果人們觀察二十歲到四十歲的村民，他們通常不上清真寺，（除非他們的父母要他們去）。原因是，他們進入現代市場工作，不能負荷齋戒，也無法在工作場合進行禮拜。然而四十歲之後，人們開始慢慢回到清真寺，開始捐獻，並認真思考攢錢以赴麥加朝

註② 參見李朝暉，「認知中國的尺度」，*戰略與管理*（北京），第39卷（2000年2月），頁91。

註③ 石之瑜，「台灣全球化過程中的女性專業人士」，*婦女與兩性學刊*，第9期（民國87年），頁55～85。

註④ 資中筠稱之為「怪圈」，見資中筠，「中國人應如何看待國際情勢和如何自處」，*中國評論*（香港），第24期（1999年12月），頁20～25。

註⑤ Chih-yu Shih, "Between the Mosque and State,"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 28, No. 2 (2000), forthcoming.

聖。已去朝聖返回的哈吉則終日虔誠禮拜，不再涉入世俗市場。可以說，利通近郊回民的轉型有兩個步驟，一步是脫離回民的宗教認同進入市場，第二步是回到宗教認同，逐步撤出市場。大陸許多地方分田單幹二十年之後，又開始推動集體鄉村企業，也是一個輪轉型的例子，提醒轉型研究者莫驟下結論，觀察期應拉長。

三、輻轉型 (multi-transition)

當輻轉型發生時，人們首先看到的是既有行為模式的轉變，人的身分與利益出現多重化與內在矛盾，^③在一定的環境裡，預期的轉型可能已經完成，但在其他的情境裡，脫離既有行為模式以後，並沒有既定的目的，故行為模式或制度轉型的觀察失去意義。也就是說，有多種轉型同時發生，其中只有一部分受轉型研究所重視，其他部分雖然影響到受到重視的那一部分，卻未受關注，使得受到重視的那一部分轉型的意義被研究者誤解。^④輻轉型的存在可以解釋半轉型行為模式，前者說明了後者受到什麼限制，以至於所預期的轉型未曾發生。輻轉型否定了轉型研究的目的論預設，凸顯出所謂轉型往往是對流行論述不得不做的回應。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職業婦女面臨多種社會要求的窘迫。^⑤教育的普及將兩性同時培訓為專業市場上的傑出雇員，但職業婦女同時必須擔負生養育責任。在職場上，職業婦女已然完全轉型，不再信服三從四德，追求升遷，自我實現，與平等的待遇，甚至抗拒性騷擾，領導男性下屬，並贏得尊重。但在幾方面，她們的轉型又不為市民社會目標所規範，比如女政治人物面臨社會期待要她扮演較好的母親或媳婦角色；職業婦女必須應家庭的需要提供配偶、子女各種情感上的支持；女外交官往往要放棄出國機會來配合家庭。在這些其他情境中，職業婦女的轉型是多方面的、輻射的，^⑥不論在傳統母性角色的扮演上，或進入職場的工作上，行為均已轉型，但只有後者才是轉型研究的對象。職業婦女進入職場是國家教育與市場經濟共同動員出來的，但她們的回應與動機有相當部分是在國家與市場之外醞釀的。

四、折轉型 (neo-transition)

週期轉型的狀態不只發生在輪轉型，轉型不完全的現象也不限於半轉型，在看似往新產權制度轉移，或民間社會自發性升高的變遷中，不同於線性史觀的轉型可能發生，也就是初步脫離既有行為模式時可能是往預期方向轉型，但轉型進程經過一段時

註③ 參見盧福營，「轉型時期的大陸農民分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第29期（2000年春），頁25~36。

註④ neo-transition 的概念是相對於 neo-tradition 而提出，關於 neo-tradition，參見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註⑤ 例見 Sue Ellen M. Charlton, Jana Everett, and Kathleen Staudt, eds., *Women, the State, and Developmen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註⑥ 參見 Karin Jurczyk, "Time in Women's Everyday Lives: Between Self-determination and Conflicting Demands," *Time and Society*, Vol. 7, No. 2 (1998), pp. 283~308; Pamela Odih, "Gendered Time in the Age of Deconstruction," *Time and Society*, Vol. 8, No. 1 (1999), pp. 9~38。

間後，卻往其他方向發展，則新產權制度的引進只能改變既有行爲，卻不能規範新行爲模式的形成。至於新模型的特質不在現代化史觀中存在，必須根據實地考察來說明。折轉型的出現肯認了轉型研究的作用，否定了目的論，類似於中體西用、去蕪存菁、截長補短之類的混合型行爲模式。

折轉型的適用是在大陸基層政治的研究中歸納得知，且在經濟行爲與政治行爲中各有千秋。其中一個轉型方向，就是結合了集體主義與市場經濟或民主選舉。在市場經濟方面，由農村集體共同面對市場風險；或由村鎮幹部以強人領導方式開拓市場，掌握機運；或由效益高的企業將村自治組織倒掛。^⑦在民主選舉方面，由反覆協商產生候選人；或由宗族、宗派、宗教決定投票行爲；或由共黨培養非黨員的領導幹部入黨。這些發展說明了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必以私有財產爲前提，所以脫離計畫體制，強調村民民主自治，推動人民大會代表制度的改革等案，均有效地將大陸政治經濟帶離了極權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但顯然並未進入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型。^⑧折轉型與一般轉型研究的共通前提在於，轉型的啓動預示了某一種新型態的終將出現，中國特色的提法，可說是一種籠統地折轉型的通稱。^⑨

五、非轉型 (a-transition)

如果脫離既有制度與行爲模式了以後，無法進入預期的制度規範，也無法發展進入軌道外另一種歷史階段，則轉型的發生成爲一種全無目的之瞬間調適，^⑩所有行爲規範在特定時空下重新發展學習。一旦脫離此一時空之後，對於甫所孕育的特定行爲規範失去記憶，當下一次再回到此一情境時，自然必須重新學習，則臨時所又發展的行爲規範，未必與上一回在同一情境之下相同。極端情況下，處在非轉型狀態下的人，可以說是一種持久轉型者，只有離開既有行爲規範的路線，沒有可循的發展路徑。^⑪非轉型與半轉型的主要不同在於，非轉型者本身拒絕自己處於有意義的狀態下，而半轉型者是處在被拒絕的狀態下。故非轉型主要的成因是心理的，代表了情感上對生活的疏離，對市場或國家的制度化動員處在被動的位置上，沒有探索或尋根的意願。即轉型的壓力帶動人們離開了既有行爲模型，卻無法將彼納入某種新的制度與參與機制。

非轉型的概念來自於對少數民族婦女的一項研究，^⑫敘述大理農村的白族婦女受教育進入中學之後，未能進一步升學，她們既沒有川、湘婦女出外到沿海城市打工的意願，在城市也不能找到適當的工作。以大理的經濟情況，又不需要她們赴沿海謀求

註⑦ 例見 John Wong, Rong Ma, and Ma Yang, eds., *China's Entrepreneur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註⑧ 例見 Kevin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1 (1996), pp. 31~55.

註⑨ 參見鄧正來，*研究與反思*（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93~151。

註⑩ 參考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民國86年），第十章。

註⑪ 參考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國，1998年）。

註⑫ 一個白族學者丁先生的轉述自己的研究發現，引自石之瑜，*中國的民族問題*（台北：五南：民國89年），頁102~103。

致富，城市受教的男性青年則看不上她們。結果，大批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婦女回到農村，與農民成家，處在十分苦悶的心情之中。又如西雙版納傣族小和尚由國家動員進入學校，夾在正規教育與寺廟學經之間，俟住持和尚赴大城市謀求更好的廟宇，而山區經濟復不容許村民提供適合的教育環境，失學小和尚終日蹲坐在寺旁，以致於漢族教育官員認為地方民族懶散落後，不求進步。^④台商在世界與大陸市場上不斷找尋新的生產部門，適應新規格，填補新的法律縫隙，以最快的速度改造生產線，則是另一個例子，並引導著大陸沿海鄉鎮企業用同樣的經營風格，適應多變的產品週期。

六、倒轉型 (anti-transition)

這個型態的轉型是說，當市場引進之後，人們為求致富而展開一系列的回應，但如果這些回應有意識地迴避了資本主義財產權制度，或以公民文化為指標的政治發展，卻明確設計與私有財產或民主制度相牴觸的各種機制，使得進入市場參與競爭或推動民主選舉的制度轉變，竟產生了維繫既有政治、社會關係的結果。與折轉型不同之處在於，倒轉型是以既有行為模式為核心的回應方式。行為所關切的不是政治參與，也不是私有產權，而是擔心自己所不得不面對的新政治參與及市場競爭，會摧毀了固有的社會行為規範。而折轉型則是在接受新規範的前提下，發展出了與新規範不一致的另一種無法事先預知的調整。倒轉型的發生，表示了一種在轉型之初就明確而有意識地抗拒態度。長遠而言，倒轉型是有可能發展為折轉型的。

許多人都參觀過的北京近郊億元村留民營，這是倒轉型提出的依據。^⑤留民營自始沒有隨國家政策進行分田，村民維持集體的生活型態，農民與幹部一起下田，一起過年，一起造房子、拉電話線。幹部持續扮演傳統仕紳的角色，以威嚴來替村民排難解紛。對於要求脫離集體的個別農民，村集體依國家政策予以同意，但自是與分田的村民分開關係，這些村民必須回村繳租金，不能和村民分企業紅利。民主選舉定期舉行如儀，既有領導結構享有無可挑戰的地位。對留民營而言，市場與選舉都帶來了轉型壓力，幹部對於集體利益更敏感，經營與致富成為共同目標，生活方式隨之變遷，但既有社會關係卻獲得維護，以公民文化為基礎的市民社會並沒有自然而然地發生。

七、反轉型 (counter-transition)

與倒轉型類似的是反轉型，反轉型是指接受了線性史觀對於歷史階段進步或落後的判準，承認自己處於較為落後的歷史階段，但反抗轉型研究所指出的轉型方式。反轉型標示了一種失去論述地位的尷尬，在接受現代化價值的同時，不認為私有財產或個人政治參與是獲致現代化的手段，反而認為既有的集體主義才是達到現代化的正確

註④ 有關傣族的現代化轉型，參見Mette Halskov Hansen, *Lessons in Being Chines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9)。

註⑤ 參見楊開煌，「中國農村自治初探」，輯於白益華等合編，*村民自治的實踐*（台北：桂冠，民國87年），頁253~295。

行為規範。更重要的，是心中有與先進社會對抗的衝動。^⑤前述倒轉型中，人們明確設計出保護農村集體的行為模型，並無意與已轉型的地區對抗，但在反轉型中，人們主要的情感傾向只是抗拒線性史觀所指向的發展模型，但又試圖達到先進社會所設定的先進標準，從而認定自己處在一種論述上無法擺脫的落後狀態。故反轉型的特色在於一種接受先進標準，但抗拒先進模式的沮喪心態之中，故進化的目的，是要對抗教導自己進化的社會。

反轉型的觀察是出自於一項對反身東方主義（*reflexive Orientalism*）的研究。比如在湘西苗族山區的德夯山區觀光表演，承認苗族有先進社會所想像的奇風異俗，目的是藉此營利，但又十分堅持這個為滿足漢族觀光客而設計的奇風異俗，就是當地的民族特色，即一方面有要抗拒漢化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接受漢人帶入的市場價值，與漢人所想像的苗族風情。另一個提示了反轉型的研究是周恩來的外交行為，他明白承認中國文化上是落後的，故一定要先在經濟、科學等領域中努力，然而另一方面相信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才是中國科學家應走的道路，且中國強大之後要反對帝國主義。^⑥在當代人權問題上，官方承認中國是集體主義文化，不適合推動個人主義人權，不過也同時接受彰顯個人主義人權的現代化價值。重點是，德夯苗族接受現代化價值的動機是區隔漢人，或對周恩來則是抗拒帝國主義。

八、超轉型（*post-transition*）

線性史觀所推崇的現代化價值在獲得先進社會的實踐之後，又更進一步往後現代社會發展。後現代的意義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指對現代化價值的反省，並試圖透過解構或顛覆的排列組合，來抗拒現代化；^⑦另一是指不以國家建制為核心的公共參與，尤其是社區化、區域化的活動，它們愈來愈佔據了人們最大多數的有閒時間。^⑧超轉型是指未曾經過現代公民文化的歷史階段，直接進入後現代的行為模型。超轉型的發生有幾個基礎，即人們在脫離既有制度規範的轉型初期，已然對現代化價值保持某種戒心；同時由於後現代階段經常出現傳統、現代兩種行為模型的隨機排列，故與現代化完成之前的社會，有某種銜接。^⑨超轉型不重視情境，所以不同於輪轉型；它又蘊含某種有意識的抗拒與選擇，因此也不同於非轉型。

超轉型的實際啟發，來自於中國傳統民俗宗教與世俗的結合，比如台灣錫安山信徒的集體生活、自我教育。信徒拒絕國家動員體制與現代化價值，有意識選擇不屬於公民文化範疇的行為規範。又比如，盛極一時，周遊列國的青海無上師，象徵了對現

註⑤ 參見張睿壯，「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戰略與管理*（北京），第32期（1999年1月），頁54~67。

註⑥ Chih-yu Shih, "Backward but Sovereign: The Counter-State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a Theory of Reflexive Orientalism,"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PRC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volving Interactions and Emerging Trend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June 3, 2000.

註⑦ 參見 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註⑧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⑨ 參見羅曉南，*當代中國文化轉型與認同*（台北：生智，民國86年）。

代化價值的超越，但同時卻又一定程度地採用了現代化的科技，並依附於現代化的資本管理體系。青海無上師對信徒的開釋中免除了任何理論框架，訴諸簡單易懂的邏輯，直接、直覺、迅速，甚至不受她自己對其他人的開釋所限制。^⑤現代社會的乩童也發展出適合現代社會的行銷與組織，但請來的神明所談的道理，多數不出傳統倫理人情。這些超轉型的制度規範，重視奉獻超越，與社群之內的相互認同。

九、不轉型 (non-transition)

對轉型壓力的一個典型回應，就是有意識地抗拒轉型，以維繫既有的制度規範。在線性史觀下，不轉型只能是短暫的抗拒，長期之後，勢必要順應潮流。如果從微觀的角度看則不然，抗拒轉型的行為模式，可以在其他社會角色均發生變遷的情況下，繼續存在，其中包括退隱、疏離等表現方式，也可以形成強烈的抗爭行動。不轉型的行為模式有重大意義的原因是，它與輪轉型、反轉型、倒轉型、超轉型享有共通性，所以，即使不轉型的抗拒方式，是唯一在公共領域與轉型主張相庭抗禮的力量，但看似薄弱的這種行為模式有助於其他對轉型主張的微觀回應繼續存在。人們在嘲弄不轉型者的當兒，往往忽略了這些不轉型的主張乃是轉型理論本身所建構激化而來，並且為轉型的不可完成性做出見證，提供抗拒轉型的其他行為者一個思維依據。

民國初年的中國文化本位派是不轉型的早年例證，當前大陸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左王、保守派、萬言書派都說明不轉型派的普遍存在。^⑥不轉型派是文化相對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雖然相對主義者未必就是不轉型者），他們的立足點卻恰恰就是現代化、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等概念，因為只有在這些概念風起雲湧的時候，他們才能表現出象徵相對主義的不轉型思維。^⑦保守派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是留民營倒轉型的重要基礎，更是與反轉型共享了反帝反殖的情感傾向，也可能成為超轉型者提供社會治療或自我治療的開釋啟示，或鞏固了輻轉型得以發生的某一種傳統家庭情境。在所有這些人中，只有不轉型者從容地與轉型理論辯駁，因為他們有意識地從根本否定線性史觀。

十、偽轉型 (pseudo-transition)

當人們用盡所有方法來完成轉型理論的表面要求，但其動機只是要贏取轉型理論支持者的讚許，本身並無任何內化現代公民價值或制度規範的需要時，就可以稱之為偽轉型。^⑧偽轉型的動機是要維繫與先進社會某一種依賴關係，這個關係可能是國家制度領域中的關係，也可以是國家建制以外的相互關係。至於這樣的關係是否帶來什麼具體的好處，或只是提供一種心理上的安定，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偽轉型也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成其他的微觀轉型模式，比如在弄假成真的情況裡，不懂得也不在乎現代公民價值的地區，經過了反覆的練習，說不定就進入了折轉型、非轉型或半轉型的行

註⑤ 參考青海無上師，「觀音法門與東南亞華人」，講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辦，宗教與全球華人座談會，參見<www.chinghai.org.tw>相關網頁，民國89年7月11日。

註⑥ 參見石柳子，北京地下萬言書（香港：明鏡，1997年）。

註⑦ 參見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⑧ 參見黃光國，民粹亡台論（台北：商周，民國85年）。

為模式。偽轉型是一種人格現象，在沒有強烈主體意識、具有權威人格的傾向，與危機之中等等條件下，偽轉型出現的可能都頗高，因為這些因素下的行為者，是以相互關係來做自我定位，並不假定有一個超乎相互關係的先驗自我存在。故要由偽轉型發展成線性史觀所期待的公民文化，其機會應當是十分渺茫的。

關於偽轉型的存在，有許多歷史與當代的實證。比如在抗戰危機中，宋美齡一再地表現成中國是亞洲最民主的國家以維持美國對中國的同情；在中國內戰之中，台灣努力移植美國的經濟制度或民主理論，以求維繫與美國之間的友好關係。近年來，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之間發生衝突，危機處理的需要造成偽轉型的壓力，如在兩岸危機之中，台灣在二〇〇〇年當選的總統陳水扁則努力將分離主義轉型成國家安全的訴求；在失去權力的危機中，台灣的外省籍政客對新台灣人的自我定位趨之若鶩，以便保持自己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和諧關係。大陸流行的一句俏皮話是偽轉型的最佳註腳，即云「認認真真走過場」。

肆、結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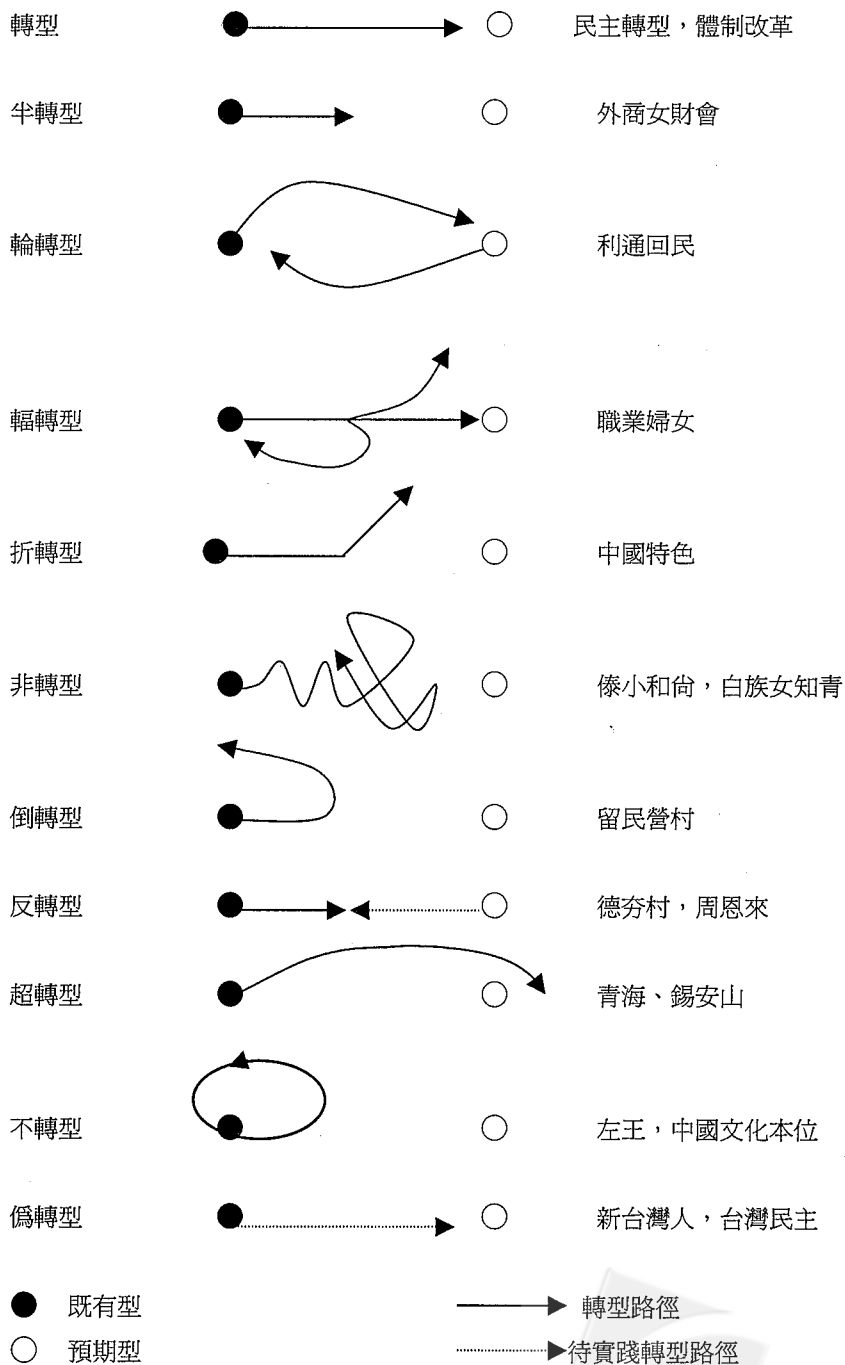
轉型研究本身應當受到在目的論、本體論和知識論上的檢討，因為這一類研究對於人們產生引導的效果，使符合某一種政治主張的分析方式得到較容易表達的機制，也使不符合的想法或情感傾向缺乏論述的空間。轉型研究固然不必明白提倡某種特定的發展路徑，但目標型的界定與隱藏的線性史觀相互強化，則造成轉型不成熟的那些條件，很自然就被當成阻擾歷史前進的因素。^④所以，即使從事轉型研究的人本身並不認可，但轉型研究的有關活動依舊帶有規範性的作用。何況，轉型的指涉，往往是制度與社會宏觀結構的變遷發展，個別人微觀的行為乃是研究中有待解釋的應變項，就好像微觀的行為真的能由宏觀的變數所決定，^⑤而相反地，又好像個別的微觀行為不能影響宏觀的趨勢。試想，當轉型研究的結果是轉型不可避免時，這對微觀的行為者而言，能說沒有壓力嗎？或竟然發現轉型的條件尚未成熟，這又將對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整體形成壓力，因為問題變成是，未來的制度規範已然繪出，你們什麼時候才會順應潮流呢？

所以，轉型研究要怎麼進行，不純粹是理論檢證或資料技術的事，而是一個有重要倫理涵義的難題。在多大程度上研究者應該從轉型的制度或社會結構來觀察行為？又在多大程度上應該由個別行為者的立場與動機，來體察制度與社會結構變遷的意義？制度或社會結構的改造，往往是政策資源配置的主觀選擇結果，比較容易觀察，再加上政策選擇不可避免地受到轉型理論的制約，則從宏觀角度分析無異於有自導自演的作用。這是為什麼本文採取了一種微觀視野，來賦予研究對象一個參與轉型研究的發聲位置。他們經由微觀分析而取得的發聲位置，並不妨礙宏觀轉型研究預設的轉型主張，但提供了宏觀研究者更全面、更深層的思考依據。

註④ 例見姜新立，「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轉型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第29期（2000年春），頁69～86。

註⑤ 例見胡佛，政治變遷與民主化（台北：三民，民國87年）。

圖一 轉型異例圖示



轉型研究是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分析當中特別流行的課題，雖然研究轉型的學者不必高舉現代化的旗幟，但由於現代化價值所預設的市民社會、公民文化、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等相關論述無所不在，故轉型研究很難迴避做出某種線性史觀的預設。但轉型研究者在引用轉型這個概念時。由於如此地理所當然，所以通常不會對「型」或「轉型」進行一些事前的觀念釐清，同時，對型的界定，以及對於轉出的型與轉入的型是從什麼意識形態中發展出來，缺乏深刻的反省，於是容易不自覺地使轉型研究染上了轉型主張的色彩。這是為什麼必須先針對線性史觀這個思維前提進行檢討，才有可能在沒有明說的轉型主張中，免於太濃厚的歐洲經驗複製風格而不自知。

本文所採用的修正方式，不是直接推翻轉型的概念，因為這樣做會遭遇到一個歷史依據空虛的困境，蓋中國歷史上沒有足資取代轉型概念的制度變遷規範，如果逕自推翻轉型研究的意義，容易流於虛無主義。本文一改轉型研究重視宏觀制度與行為結構的特性，主張一種微觀的轉型研究，強調的是對轉型主張的多種回應異例。這些異例經過簡單歸納而來，故不是窮盡的，想必還有更豐富紛雜的調適模式有待整理。未來的轉型研究除了繼續探索更多的回應可能路徑，將回應者的動機認真分析，便可以更完整地建立轉型的意義範圍。此外，也應當實證地去檢視這些微觀轉型模式之間的關係，比如說，在上海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大量復古的文化現象，可以視為一種次轉型（sub-transition）；或改革開放將大躍進以來的制度一件件撤銷，可以視為一種去轉型（de-transition）；或由於經濟分工而使兩岸現代化共生但不同步，可以視為一種共轉型（co-transition）。這樣才能濟當前轉型研究之不足，說明到底微觀異例是常態，還是宏觀轉型才是常態。

* * *

（收件：89年7月24日，修正：89年8月17日，接受：89年8月29日）



Anomaly as Serendipity: Gathering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Political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Chih-yu Shih

Abstract

Current scholarship on transition studies adopts a liberal, linear, and macro approach. This paper takes a motivational, non-linear, and micro alternative to transition. It uses ten examples of anomaly, collected and deducted from past research, to suggest that transition is a discursively inappropriate concept for China studies.

Keywords: China Studies; Political-economy; democratic transition; reform;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